

充分认识毛泽东寻乌调查的重要意义

朱钦胜

今年是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。今天，我们重温寻乌调查，不仅要深入了解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历史由来和具体实践，更要充分认识这一调查在整个农村调查中、在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重要意义，从而更好地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。

寻乌调查在形成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。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，这是毛泽东通过长期大量的调查研究，特别是寻乌调查而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。寻乌调查，是他在做过湘潭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、长沙、永新、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一次“最大规模”的社会调查，也是他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中十分重要而亮丽的篇章，直接推动了他对调查研究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升华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，写就了《调查工作》（后改为《反对本本主义》）这一绽放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哲学著作。首先，他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鲜明提出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的科学论断，指出“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，去指导斗争工作，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，那末，它的结果，不是机会主义，便是盲动主义”。纠正的方法，就是努力做好实际调查，只有这样，才能洗刷唯心精神，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，将调查研究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

的高度予以重视。其次，他从实践论的高度提出“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”的科学论断，指出了调查研究的目的和内容，“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，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，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”，而“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，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，它是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，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，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”。第三，他从方法论上提出了“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”的科学论断，指出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，使得“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，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，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，这种调查用处不大，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”，进而阐明了调查研究正确态度和技术方法，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、调查会到些什么人、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、要定调查纲目、要亲身出马、要深入、要自己做记录，以及要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、把“马上观花”与“下马观花”有机结合起来；等等。这些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，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在以后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论述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。

寻乌调查为制定土地革命正确路线提

供了重要依据。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，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。因此，制定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，成为当时革命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。毛泽东的寻乌调查，就是对寻乌县的农村和县城各阶级进行深入剖析的典型。比如《寻乌调查》中的“寻乌城”这一部分呈现出的寻乌城人口结构：城市中的地主、商人、传教士等作为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13%，农民、手工业者、游民等作为被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87%。其中地主和商人中，反动派只是少数，一部分是中间派，一部分还是同情革命的。通过调查，他进一步厘清了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所受的剥削压迫，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盘剥状况，以及“下九流”阶层的意愿和诉求。同时，更深层次地认清了富农的本质及其政治态度，提出不仅要抽多补少，还要抽肥补瘦，从而使富农也能活得下去不至于反抗而倒向敌人的阵营，切实回答了能否将富农拉入革命队伍的问题；调查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存现状，回答了能否将其视作革命同盟者和革命的动力之一的问题；等等。这些为毛泽东掌握土地分配的实际状况，弄清楚富农同贫农斗争的关键所在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“抽肥补瘦”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。正如他后来在《关于农村调查》一文中所说：“我作了寻乌调查，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，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，不仅要抽多补少，而且要抽肥补

瘦，这样才能使富农、中农、贫农、雇农都活下去”“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，我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”，据此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的正确原则，即依靠贫农雇农，联合中农，限制富农，消灭地主阶级，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，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中依靠谁、团结谁、打击谁的正确路线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寻乌调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。《反对本本主义》是寻乌调查的直接产物和理论硕果，与《寻乌调查》一起被称为“寻乌二著”，二者相互影响，互为支撑，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，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。通过寻乌调查，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国情，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，明确指出：“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，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‘先哲’，而是因为他的理论，在我们的实践中，在我们的斗争中，证明了是对的。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”“马克思主义的‘本本’是要学习的，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。我们需要‘本本’，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‘本本主义’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引领。

（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）



创新驱动加快建设江西制造业强省

闵宇龙 齐亚伟

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，是立国之本、兴国之器、强国之基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，“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，推进新型工业化”，这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。江西作为中部地区制造业大省，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。据今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，2024年，江西高技术制造业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提高到21.7%、33.6%。但也要看到，在高端芯片、工业软件等领域“卡脖子”的问题依然突出。当前，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加速重构，产业链供应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，西方国家针对我国高技术领域和先进制造业的打压不断升级，鼓吹“脱钩断链”、构筑“小院高墙”，我省制造业发展也面临“高端封锁”与“低端锁定”的双重挑战。如何构建富有韧性的制造业创新体系，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，加快建设制造业强省，成为我省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。

构建“政企研”三位一体协同创新发展机制。健全完善政策协同和制度保障体系。加强产业链创新协同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，健全完善以“创新链专员”为核心的多部门联动和全社会参与的产业链韧性评估机制，增强全方位实时和动态产业监测与预警能力。强化政府总体层面的产业统筹协调机制。从省市县层面构建产业创新多元协同机制，根据各地产业特点、发展阶段、创新需求等分区施策，积极探索在政策引导、金融支持、人才培育、成果转化等领域广泛开展协同行动，持续提升产业创新的经济社会服务保障能力。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金融支撑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。紧紧围绕企业创新发展需要，把“赣金普惠”平台建设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工作，在项目立项、资金配置、风险管控、成效评估和运行监督等环节进行优化，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探索构建产学研用一体、多层次人才培育的创新驱动机制。建立产业创新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，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效率和水平，加大“数字工匠”培育和专业化人才定向培养力度，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。

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。强化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监测体系，构建以算力网络、云计算、大数据与多平台协同技术为核心的“四维一体”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标准，积极探索全产业链响应的数字化联动机制建设，实现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实时监测和快速响应。强化数字化转型服务设备的研发应用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，研发和应用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设备，如智能算力网络、工业互联网平

台、数字孪生体系、安全防护屏障等，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快速、有效地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，提高经济转型升级效率。建立数字基础设施评估技术方法体系。立足江西发展实际，开展多情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评估，全过程统筹管控数字风险识别、评估，统筹管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及成效反馈，为政府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抓手和长效监管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组织开展数字技术对区域和行业转型的影响研究，制定数字安全标准规范，推动企业人工智能“产业大脑”建设和“上云用数”行动所需关键技术的难题攻克，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科技支撑能力。

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。强化产业链的协同机制，构建并深化以“链长统筹、链主引领、基金赋能、平台支撑”为核心的“四轮驱动”立体化推进模式，积极探索产业生态系统建设，对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精准识别和快速补强。强化产业链关键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。在产业链现代化建设中，研发和攻克超细铜箔、航空复合材料等关键技术，建设国家级创新中心，在产业链薄弱环节实施“揭榜挂帅”制度，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。建立产业链绿色发展评价体系。立足江西产业发展实际，开展产业链融合升级策略评估，全过程统筹管控产业链风险识别、评估，统筹管控产业生态系统建设实施及成效反馈，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等新兴技术与制造业生产全过程深度融合，优化企业生产布局、产品设计、物流配送和回收再利用各环节的数字化管控水平，提高制造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绩效。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转型升级。准确把握“双碳”目标下产业转型面临的紧迫性，针对江西制造业结构偏重、能耗排放高、能源依赖度大等瓶颈问题，加强对重点行业能源结构优化、清洁能源开发、工业流程节能减碳技术的系统性研究，摸清产业链不同环节的能耗与碳排放特征，因地制宜布局绿色智能技术应用，积极促进绿色智能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推广，培育一批产业链龙头企业，带动形成一批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，稳步提高江西制造业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。

【作者单位：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数学学院。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“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创新网络韧性的形成、演进及评价机制研究”（72363015）、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“中国制造业协同创新网络韧性的形成及评价机制”（GL24104）和江西省社会科学“十四五”基金项目“创新生态系统驱动江西制造业发展能级的作用机制研究”（21XJ05）成果】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”。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基石，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。当前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速，乡村治理正面临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型的历史机遇。如何以党的建设为引领，以数字赋能为手段，构建科学高效、协同共治的乡村基层治理新格局，成为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课题。

党建引领，夯实乡村治理的政治根基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“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，抓党建促乡村振兴”。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，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效能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，“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”，明确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地位。江西省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有不少典型经验。例如，通过“智慧党建”平台，将党员教育、群众诉求、政策宣传等功能集于一体，既强化了党组织的服务能力，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一些案例也很有特色。比如，抚州市通过设立“乡贤理事会”，吸纳本地企业家、退休干部等参与矛盾调解、公益服务等工作，增强了治理的群众基础。这些实践表明，党建引领不仅能够整合多种资源，还能通过组织动员和制度创新，推动治理责任落地见效。

数字赋能，为破解难题提供技术支撑。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。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明确要求，“实施‘互联网+基层治理’行动，完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，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，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”。数字技术通过数据整合、智能分析、远程服务等功能，能够破解乡村治理中信息不对称、资源分散、效率低下的难题。例如，兴国县通过生态清洁小流域项目，利用数字化监测技术实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，并结合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，形成“小流域+水保文化”“小流域+乡村旅游”的特色模式。吉安市通过“数字乡村一张图”系统，动态整合人、地、事、物、数等数据，为治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。这些案例表明，数字技术不仅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和效率，还通过资源优化

配置推动乡村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。

多元共治，构建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。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循环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，“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”。通过创新协商议事机制和激发社会力量参与，探索多元共治的有效路径。在自治方面，南昌县“五彩”党群服务队通过政策宣传、矛盾调解、产业发展等服务活动，与数字乡村建设深度融合，把治理效能转化为发展动能。在法治方面，于都县通过乡贤、老党员、老干部等组成的“乡贤调解团”化解历史遗留问题，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。在德治方面，多地通过“乡贤理事会”和“小院议事厅”模式，推动群众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。这些实践表明，多元共治不仅能够凝聚治理合力，还能通过文化浸润和价值引领提升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。

制度创新，完善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机制。制度建设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石。通过完善党建引领的制度体系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，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。例如，通过制定村级组织权责清单，厘清村级组织的法定职责，减少“小马拉大车”现象。此外，一些乡村通过“逢四说事”“凉亭说事”等群众议事平台，实现群众议事制度化。在考核激励方面，将乡村治理成效纳入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内容，建立“党建+治理”绩效评价体系。同时，通过评选“最美网格员”“优秀志愿者”等典型，激发基层治理活力。这些制度创新表明，通过明确权责边界、优化考核机制、强化典型带动，能够有效压实治理责任，推动治理效能持续提升。

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，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支撑，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。江西作为革命老区，在党建引领和数字治理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，未来应进一步深化政策创新，推动治理模式从“经验驱动”向“数据驱动”转型，为全国乡村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江西智慧。只有如此，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，书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壮丽篇章。

【作者均系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副教授、九江市数字乡村发展技术创新中心研究员，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（JD20052）成果】

党建引领构建乡村基层治理新格局

黎敏 潘求丰

